

【在人间】

桃花十里笑春风

□ 孙启洋

曲阜小城是历史悠久的文化城市,槐序四月,一个桃花盛开的季节,城郊的小坡,开满了遍野的桃花。小城景色秀丽,护城河将它紧紧环抱,别致的古建筑依势而建,不经意开窗,就是一抹风景,一窗一景、移步换景。满涵鲁国遗风的亭台楼榭与桃花相映成趣,那朵朵桃花印着四月的火红,热情挥洒在山坡上,把春末的小城装扮得分外温情。

某一个清早,泛起了薄薄的晨雾,早起的游人踏着轻快的脚步游走在鲁国遗址。桃花被春风渲染成片片桃风,四月的游人站在桃花树下,望着花尖任由多多花蕊点亮内心深处的秘密。花儿映红了小城,粉嫩的花萼簇拥在枝头,有一种“满树和娇烂漫红,万枝丹彩灼春融”的别致。有的树梢朵朵花蕾

含苞待放,有的绽放笑靥,或独自绽红,粉色的花瓣像蝴蝶的双翼,纤细分明的脉络柔软而淡薄,浅黄的花蕊飘着诱人的清香,脱俗而不妩媚。桃花就像一张张浪漫而深情的情网,在鲁国古城中飘逸安然。我在树前驻足凝神,无尽的留恋任思绪无限蔓延,伴着被繁花揉碎了的梦幻,徘徊在桃花树旁。阵风吹过,桃花舞动,犹如在旷野中激情燃烧的火焰,蝴蝶在这片火焰里扇动着翅膀翩翩起舞,蜂群亦与桃花互相拥抱着幸福。

依一袭亭台,倚一袭水榭,那艳丽的红,醉人的绿,一缕缕的桃花长廊婀娜多姿,行走在桃花长廊,总让人想起了崔护的诗:“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言语率真自

然、清晰流畅,一直被后人传唱而经久不衰。在崔诗人之后,似乎桃花总和爱情有不解之缘。桃花总能惊扰一帘春梦,映红了故城,也映红了游人春恋的情结。盛开的桃花如彩缎缤纷点缀着整个春天,也给已经到来的初夏赋予了浓郁的芬芳。青烟缭乱,初夏悄然醒来,舒展着打开了一纸传说,给盛夏的故事编出来一个绚烂的未来。也许崔诗人还没有所谓的桃花运,只不过是偶然间的惊鸿一瞥,就让自己徒添了求之不得的烦恼。

穿过千百个轮回,诗韵伴随着妩媚的桃花,独自行走在桃花源里,花开花落任崔护吟咏千年的诗句和浪漫的情怀沁入心扉,那缕惆怅的忧伤随着“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亦飘然走来,来不及触摸

的爱情,伴随着天长地久的相思都成为游人们找寻桃花的借口。桃花那平仄的清香,守望千年的桃花园,如诗一般美丽的篇章,和桃花一般盛开的记忆。不管时间会怎样的流逝,在这片桃园下总有无法忘却的记忆,每一道划过的风景,都会成为醉人的桃花酒,醉了青春,醉了人生。我沿着那漫漫的诗韵,轻抚桃花晕红的魂灵,指尖触碰到的是烂漫的细节。

或许,媚眼如丝的花容月貌,大多生命会短暂似流星,也不愿意将衰老的模样留在人间。此时,片片桃花格外显眼,在山坡上迎风飘动,花枝摇颤,片片花瓣随风落下,繁花满地,落英缤纷。我信手拈起花瓣,且把桃花锁在记忆里的春天。

【有所思】

小巷情结

□ 徐淼

在北京生活多年,我对胡同有种根深蒂固的情感。离开祖国首都,侨居欧洲,莫名地滋生了一种小巷情结。每到一个新的城市,只要有类似胡同的窄路,我就一定要往里钻,即使是死胡同,也要看个究竟,有时就是为了欣赏一下尽头人家僻静的小院,或是向深不见底的古井中望一眼,似乎在那里能够找到故乡的影子。

在小巷中,我从未感受过戴望舒《雨巷》的那种悲观,更不会像他那样干等“像丁香一样的结着仇怨的姑娘”。我的小巷记忆里装满了阳光和暖洋洋的好心情。



周庄的小巷,虽说只有黑瓦白墙,但却一步一景,丝毫不显单调。小桥流水,绿树红花。我喜欢避开游人常走的主干道,在小巷尽头的河边坐下来,呆望河中嬉戏的白鹅或木窗旁择菜的老人。

西班牙海滨小城科尼尔的小巷,纯白而简约,平时很清静。可一到七八月份,小路两旁便摆满了桌椅。游人们觥筹交错,欢声笑语,给小巷渲染上了浓浓的生活气息。大西洋就在不远处悄悄守候着小巷人家,用湿润的海风抚慰着胡同的每一个角落。

威尼斯的小巷和水巷错综地穿插着,仿佛是打乱了的彩虹。无论淡季还是旺季,这水城丝毫不肯在色彩上怠慢自己。光与影和谐地映照在那些老房子上,红、绿、蓝、黄、紫……水路是小巷的延伸,即使走到了路的尽头,还可以登上船儿,故事仍旧没有结束。游人坐在彩色的贡多拉里,任凭高歌的船夫载着,徐徐地穿行在彩虹之路里……

日本京都花街先斗町狭窄的小径两边,尽是棕色木格子门庭。白天看显得过于朴素。可到了夜晚,店家便会挂起灯笼和彩色招牌。偶尔,小巷中还会闪过歌舞排练场里身着绚丽和服的歌舞伎。她们的脸涂得雪白,手

里拿着绣花包袱,木屐有节奏地咯咯作响,就这样穿越时空般从行人身旁婀娜走过。

有时,小巷中的一个人,会在我的记忆里化作整个城市的“明信片”。在佛罗伦萨,让我最难忘的不是高大华美的圣母百花教堂,也不是琳琅满目的金店。至今让我回味无穷的,是一位陌生的巷中女子。那是在某条不知名的小路上,我从一家首饰店门口经过。店铺淡黄色的落地窗被黑色的框子隔成几块。铁门旧得有些发绿生锈。这时,从金店里走出一个身材中等偏高的消瘦女人,黑衬衫,笔直的黑西裤,黑皮鞋擦得很亮,黑色的长发衬得她的脸庞越发苍白。她点上一支烟,吸了一口,头微微向左转,然后用右手夹着那支烟,左手放在右腋下,托着右臂,身体向右微倾,左脚稍稍向前撇出一寸,稍低着头,好像在沉思,然后又抬起目光,静静地望着小巷的深处……这一幕是幅再贴切不过的佛罗伦萨图景!旧时文艺的兴旺和颓废的拜金,仿佛都随着女人的烟圈,飘散在小巷中,凝固在石墙里……

猫儿是巷子里古老的精灵,常常像历史学家一般,缓慢地踱着步子,或懒懒地歪着趴在地上,

伸长腿,眯起眼。如果有人经过,它们可能会仰着肚子蹬蹬腿,撒撒娇,希望能讨个零嘴儿吃。

欧洲老城鱼市周围的胡同里,常常飞满了白色的海鸥,厚着脸皮等待吃鱼的机会。集市上的食物,得来容易,何须自己到海里去寻觅?有的水鸟趁鱼贩不注意,叼起一只刚打上来的新鲜鱼儿,一溜烟儿地飞入小巷,拐几个弯,就不见了。如果抢不到新鲜的,在小巷人家遗弃的食物里找些零食,也很幸运。我曾看到一只小海鸥,硬是用嘴将一个比自己体型大两倍的垃圾袋拖进了小巷。它仔细寻觅了一个僻静的角落,确定没有威胁之后,才把袋子啄开,慢慢享用。

小巷好像故意打造了一个集中的纵深空间,让人打开各种感官去体会,去寻觅。路窄,人的密度高,共生人群必然孕育传统,造就特别的生活方式。小巷是市井人文的天然博物馆。它可以是大上海经过现代化渲染的弄堂,也可以是南美贫民窟里那些滋生罪恶和痛苦的夹缝。不管是美好的、阳光的,还是贫穷的、罪恶的,十几年来,我的小巷情结始终如一。在异乡的巷子里,我寻觅着故乡的影子,也寻觅着一方静谧的心灵寄托。

【浮世绘】

显微镜下看世界

□ 孙葆元

夹竹桃是从江南移栽过来的植物。济南后坡街11号院的夹竹桃是它真正的主人余萱堂栽下的。1947年,已经主持了济南多家西诊所化验诊断工作的他决定买下一处房产。也像当下一样,通过房产经纪人介绍,买下这座11号院。他很得意,当时房主索要十二两黄金,几经周旋他只用二两半黄金就将房子买下。成交的秘密半个世纪后才由萱堂先生的公子余嘉音告诉我,其一是当时济南解放在即,解放军把这座城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城内的国民党要员惶惶不可终日,急于将不动产出手。其二是,这座房子最豪华的两个套间住着一位神秘房客,是国民党济南调查局的中统特务,这个家伙自恃身份特殊,大模大样地住着,从不交房租,让原房主苦不堪言。遂以低价将房子卖给萱堂先生,实际上是转嫁了自己的经济危机。萱堂先生还是很高兴,他曾经是穷小子,靠着打拼挣下这处房子,有了容身之地。他在买下这座院子后就种下了这株夹竹桃。

我去过那两间神秘的住房,美国松木的地板,三面高窗,厦檐遮挡着门庭。我进去的时候嘉音和菊嫂居住着。房管部门对这座房子的评价是二类一级,二类指平房,一级当是顶级。

萱堂先生所料不错,他搬进

去一年,济南解放战争的炮火就轰鸣起来,那个中统特务随国民党撤离济南的最后一班飞机逃往南京,11号院和毗邻的另外两个院子安静下来。五十年后,听着嘉音教授徐徐地讲述,我脑海中浮现出萱堂先生的形象。他永远推着一辆德国产的自行车出入院门,裤脚处一边卡一个夹子,是为了保护裤脚不沾上自行车链条的油垢。他也是家父的朋友,这大院里两个教授级的人物,他们之间的话题是生与死。萱堂先生常说的一句话是:死于无知。什么叫“死于无知”?我百思不得其解。

萱堂先生是研究细菌学的,上世纪30年代在齐鲁大学医学院师从美国教授学习临床检验,毕业后就留在齐鲁医院化验室工作。1941年,珍珠港战争爆发,迫使美国对日宣战。侵华日军立即对美国人在中国经营的齐鲁医院强行查封。在齐鲁医院工作的中国医生为了谋求生计,联合起来成立了新的医院,这所医院选中了县东巷北首皇华馆街的一座豪宅做院址,就是今天的济南市第一人民医院。萱堂先生主持化验室的工作。有细菌学就有抑制细菌的医疗科学,这在以中草药为医药手段治疗疾病的中国是前沿医学。1939年白求恩大夫在晋察冀边区为我们的八路军战士做手术时不幸被细菌感染,当时的中国

医生试图抢救,他拒绝了,说,不要抢救了,没有救,败血症!如果那个时候有抗生素,白求恩大夫不会逝世。两年以后青霉素问世,当时青霉素使用音译,叫盘尼西林。萱堂先生率先成为中国第一代细菌学专家,他对中国医疗事业的贡献是革命性的。一时之间济南所有私人诊所都请萱堂先生去做化验,报酬丰厚,他几乎没有时间回家,骑着那辆德国自行车满城飞奔。他没有去想报酬,想的是救命。济世的心肠换来了那个栽着夹竹桃的11号院。

萱堂先生的眼睛看的是显微镜下的世界,在显微镜下他发现细菌有变异的本领,像孙悟空用七十二变抵抗抗生素的作用。他提出慎用抗生素。可是没有人理会他的呼吁,人人都有急功近利的心态,都想一蹴而就。五十年后抗生素的剂量呈几何倍数增长,医生们急切地警告,再滥用抗生素它终会有失效的那一天。那一天是什么?就是白求恩大夫告诫的那句话:没有救!这时候我才明白萱堂先生那句话:死于无知。我们对世界的未知需要用生命的代价去追寻,我们对自己和这个世界,甚至对自身这个世界有多少了解?多少无知误导着我们,一个个无知叠加起来,足以让我们以生命的代价换取一个明白。

正是显微镜差点让萱堂先生

身陷囹圄。1951年11月全国开展了声势浩大的“三反五反”运动,在此之前,皇华馆医院丢失了一台显微镜,萱堂先生是化验室主任,自然成为当时的“大老虎”,对他展开了一百多天的讯问。最严酷的时候,不让他睡觉。他熬不住了,向工作组下跪,谎称将显微镜放到一位朋友家,他向那位朋友写信,请求他把显微镜送来换取自己的自由,他将卖掉11号院补偿朋友的损失。萱堂先生太天真了,把一场政治斗争看成朋友间的误会与信誉,这是他在显微镜下看不到的世界,是他的无知。幸亏几个月后在医院的煤炭堆里发现了那台丢失的显微镜,原来在解放战争到来之前,有人怕医院的设备有损失,悄悄埋到了煤堆里,时间长了,竟忘掉了。这场风波差点断送了萱堂先生。

萱堂先生真的恢复自由了,他的月薪是200斤小米。到发薪水那一天,以《大众日报》公布的小小米价格折算成现金发放。这一标准按市值为90多元。十年后,组织上有意让他出任一家重要医院的院长。大概是对那场显微镜风波仍然心存余悸,他婉拒了。萱堂先生终于说出“死于无知”的注解,他说,前人的死是为后人的健康铺路。这是一个医生的哲学观,然而,他看不懂显微镜外的宏观世界。